

经济变动所包含文化因素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问题^{*}

——以东北亚中国、韩国、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现象为例

陈 勇 勤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由于文化因素在经济模型中难以量化,因此研究方法就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要注意区分工业化与现代化,在整体主义和动态分析当中观察相关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识别政治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经济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习俗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最终目的是要揭示中韩日在 21 世纪初期的社会结构变迁这个问题。

关键词:经济变动;文化因素;同质性;异质性;东北亚

中图分类号:F08;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5)02-0103-07

一、前期准备:哲学对我们思维的启发

(一)文化因素在经济模型中难以量化与借助方法论做一种探索

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如何有效地利用文化资源,这个问题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它由对 3 个问题的组合联想而生成:(1)人们习惯于把社会存在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 3 个板块,那么三者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2)文化资源在我们比较国际资源禀赋差异时总要涉及它,并以独立的一个范畴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两个范畴相并列。文化资源集中体现在文化遗产、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可见它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向经济学切入一个很好的点。(3)西方经济学有一种忽略经济生活中文化因素的倾向,原因是文化因素无法吻合经济学领域生产出来的通用成长模式。难点在文化因素必须量化才能放到经济模型当中,而且做过尝试的研究人员有不少已经认定要精确测定文化因素影响率是徒劳的。问题终归需要解决,因此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从方法上去寻找出路。

我想,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个是实证主义的,但需要采用“间接寻源法”,也就是当某个因素无法直接显示它的数据指标时,不妨通过与它相关的其他因素可以显示的数据指标来解决。比如,人

力资本存量主要由文化因素构成,或者说它是教育的产物,但直接很难测量出来,这样就不妨从几个角度考虑:(1)用教育水平作为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教育水平又通过平均受教育年限、成人识字率和入学率等指标来反映,当然需要具备充分条件,像平均受教育年限这种指标必须获得连续时间序列数据;(2)在教育投入大致可以反映教育产出前提下,也可以用教育支出作为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间接指标;(3)当人力资本存量涉及身体素质(劳动力质量)时,还可以用健康支出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4)经验积累使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但经验积累指标却不能直接得到,我们发现进口品(尤其是资本进口品)往往是技术模仿的主要载体,就可以用进口有关数据作为体现经验积累的指标。

另一个方法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关注理论建构,重视质的分析,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为数理研究提供良好的理论假设,因为只有建立起明确的理论假设,才能使数理统计方法得到更好的提炼。在无法借助实证主义方法时,特别需要以想像力并通过思想实验“创造一种理论”,任何时候都“不存在一条通向理论的确道路路”。

(二)工业化的静态特征与现代化的动态特征使思辨的结论较为明确(非模糊)

工业化主要是指利用机器替代人力的一个过

收稿日期:2005-01-07

作者简介:陈勇勤(1957-),男,四川省宣汉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本文是 2004 年 6 月在韩国汉城“th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conference of the front and tendency of the China learning progress in the 21 century”的报告论文。

程,机械化时代是机器功力替代体力,电子化时代是计算机运算能力替代脑力,这些都与时间因素无关,所以工业化被我看做是静态的。现代化不同,它总是与时间因素有必然联系,没有时间序列的过去、今天、未来也就没有现代化的“现代”这个概念。当它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时,人云亦云,现代化最多也就只能保留它的发展观内涵。特别是现代化在物质文明方面倒也好说,但是在精神文明方面却存在以谁的文明为标准,宗教意识冲突明显反映出不同文化的融合是相当困难的。

按我的理解,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有一点已经明确,二者都属于由相对低级向相对高级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是一种发展、演进,变化的人为性还引出“实现”问题,包括实现目标—标准、发展程度—指标等。

1. 简单来看,工业化针对社会大系统当中经济子系统的演进,涉及整体包含的某一领域;现代化针对社会大系统地演进,涉及一个整体。

2. 如果进一步讲,首先应该设定现代化概念。就一个国家而言,对现代化可以做整体性、领域性和实体性3个层次的划分。整体性的现代化是指社会整体的现代化,相近的概念有国家现代化、现代化社会等,它在实现目标—标准上、在发展程度—指标上分别需要具备综合性的评判体系。领域性的现代化是指社会某一领域的现代化,相关的概念有经济现代化(再细分比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等,它在实现目标—标准上、在发展程度—指标上分别需要具备本领域内综合性的评判体系。实体性的现代化是指企业、机构等运作实体的现代化,它在实现目标—标准上、在发展程度—指标上按理不存在细分的个性化东西,可依据的只能是该实体所归属的某一领域的评判体系。

3. 应该设定社会概念。需要做大系统的广义社会与子系统的狭义社会两个不同系统的区分,大系统广义社会包括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文化子系统以及狭义社会子系统等,涉及其中基本的产物—交换关系、秩序—管理关系、知识—延续关系和群体—交互(交往互动)关系;子系统狭义社会只是针对围绕群体—交往关系而生成的那些现象,比如社会结构中的家庭、国家、企业、阶层、城市、社区等社会结构要素,可以认为由这些要素组合出一种学理上的狭义社会^{[1](P5)}。

4. 严格讲,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应该有一定区别。工业化在实现目标—标准上、在发展程度—指标上也需要具备综合性的评判体系,比如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制成品在出口贸易结构中

的比重等,达到相应的公认目标指数就可以认为工业化已经完成。工业现代化应该是现代化对工业发展的一种要求,比如现代化要求工业从工具操作机械化演进到工艺流程机械化,后来又要求演进到企业管理机械化,也可以说工业现代化是对工业企业的一种发展要求,是从领域性的现代化具体落实到实体性的现代化,它关键在于以当代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改造传统工业,因此又被看做工业化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就工业化来说,要点在通过产业结构转换使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机器脑”制造代表的信息工业是新兴工业部门,它是信息产业生存的前提条件。如果信息工业逐渐在工业结构中占重要地位,同时信息产业也逐渐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那么也可以认为这是新一轮产业结构转换,是继工业化之后的信息化。

5. 对于整体性的现代化(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已经有一些研究结论给出不同的衡量指标。其中最受关注的几个见表1。

表1 整体性的现代化不同的衡量指标

指标名称	提出者	指标涉及
人文发展指数(HDI)	J. 埃斯特丝	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健康等领域
社会进步指数(IS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 人均预期寿命 (2) 成人识字率 (3) 人均GDP
现代化指标	A. 英克尔斯	(1) 人均GNP (2) 农业生产占GNP比重 (3) 非农业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比例 (4) 识字人口 (5) 服务业产值占GNP比重 (6) 适龄年龄组中上大学人口的比重 (7) 每个医生服务的人口 (8) 平均预期寿命 (9) 婴儿死亡率 (10)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11) 人口自然增长率
现代化发展程度比较指标	L. 霍罗威茨	(1) 出生率 (2) 平均寿命 (3) 城市居民 (4) 识字率 (5) 大学生 (6) 选举投票率 (7) 中等职业阶层占全体在职人口的比例

说明: HDI 即 Human Development Index。ISP 即 Index of Social Progress。

根据 HDI 涵盖的各领域,特别是其中涉及的“社会”领域,可以说明我们对“社会”概念做出大系统的广义社会和子系统的狭义社会这种区分是必要的。现代化总要同社会结构有一定联系, HDI 已经包括这个因素,现代化发展程度比较指标涉及的职业、阶层也正是社会结构的要素,现代化指标和 ISP 通过教育这个角度同样可以反映社会结构。认为教育可以反映社会结构,是由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间接导出的。社会流动主要反映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后者又是与社会结构相关的社会

变化的人为性是指由发展、演进或进化等所限定的这种变化具有主观判断的意义,并非客观变化。发展性变化反映了社会进步。

变迁,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所致的社会变迁直接体现在社会结构。这里已经被设定了条件,即社会结构变迁只是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部分而非社会变迁的全部。既然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有一定联系,流动途径之一又是教育成就,教育也就同社会结构有了相应的关系。总之,我们是想通过现代化衡量指标来提醒注意,社会结构伴随现代化会发生变化,成因在于现代化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变迁。“现代化社会流动”表示现代化引致社会流动;“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变迁”表示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引致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有多种定义。曾经提出“现代化指标”的美国学者 A. Inkeles 认为,社会结构可以分为“具体”和“分析”这两种,具体结构

是指制度、家庭、法庭、工厂等,分析结构是指在许多具体结构上社会方式的总和,社会依靠这些方式来实现货物的生产和分配、力量的控制和其他技能的需要;而且制度的组合构成社会体系,制度属于社会中的支柱体系^{[3](P100)[4](P24-25)}。这种观点与本文前面设定的“领域性的现代化”和“实体性的现代化”两个概念有类似,可以认为分析结构相当于领域性的,具体结构相当于实体性的。由此说明,对社会结构首先要避免不分领域、实体而笼统地去理解。

这里我们对社会结构的一些定义做了综合处理,目的是在归纳基础上显示出几个要点。具体见表2。

表2 社会结构定义的几个要点

项目	核心内容					
	社会要素		社会系统		社会地位	社会身份
相关概念	概括:群体;组织;社区 具体:家庭;宗教;党团		社会要素的组合状态		在社会结构中关系状况 在关系体系中所处位置	法定或公认的社会地位 职业;单位;权力;声望
层次类型	两种结构说	两个类型说	两个层次说			
	具体结构 分析结构	直接看到的结构 调查描述的结构	简单结构 复杂结构	要素按微观层到宏观层排列 角色;制度;群体;阶层;社会		宏观: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微观:各角色及相关规范
要素关系	路径:内部构成(原有或新形成) 职业:社会分工 对人划分层次 社会分层		要素关系 与社会要素层次相应的社会结构含义(社会结构内容):个体互动结构;群体结构;组织结构;社区结构;制度结构;意识形态结构			
内涵表现	传统社会:等级结构 阶级社会:阶级结构	社会结构是什么? 要素—关系—网络	它有什么特点? 稳定;有序;模式	它体现什么? 一定的社会规范	它靠什么维系? 相应的社会制度	

说明:本表内容主要参考关于社会结构的 A. Inkeles 解释、R. Brown 解释、富永健一解释等。

在工业化进程中,每个国家都会按照自己所具备的条件形成“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类型。认识这些类型对我们解决课题涉及的问题很有帮助,也就是说需要弄清应当把某个国家比如韩国放在哪一个平台上去观察,而以往的有关概念带有模糊性,使我们在处理问题时难免感到困惑。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将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做了一些修改,并编制为表3。

表3 对与工业化相联系的国家“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类型的认定

传统概念	发达国家	半发达国家		不发达国家	
	工业化国家 工业发达国家	新兴工业化国家、半工业化国家 (脱离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笔者理解	发达国家	强-半发达国家 准发达国家	弱-半发达国家	不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发达工业国	一般工业国	农-工业国	农业国	
	已完成工业化	即将完成工业化		正在进行工业化	启动/尝试工业化
		工业化		(高中低3层次)	
	工业国		农-工业国	农业国	

二、具体研究:整体主义、动态分析帮助我们认识各因子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的特征是“知识 延续”。对文化概念我有一个假设:广义文化定义由文化共性的内涵和总

体文化的外延构成,狭义文化定义由文化个性的内涵和专项文化的外延构成。另外,当我考虑经

社会流动的 Sorokin 定义显示,社会流动意味着个人“社会位置的移动”。该定义是社会学家 P. A. Sorokin 在 1927 年发表的《社会流动》一书中。与社会流动相关的还有两点:(1)流动类型。垂直流动(Vertical mobility),指社会分层位置上的上下移动,分为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和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水平流动(Horizontal mobility),指同一等级位置上的横向移动。(2)流动原因。人口特质、环境变化(主要指技术更新)和天赋差异是造成社会流动的三大因素。

根据有关的分析结论,社会流动途径主要包括职业改变、经济上的成败、政治上的成败、教育成就、权力的控制、婚姻等^{21(P6-7)}。需要注意,狭义上的定义并没有抛弃文化的本原性含义,这是指“产+用”共性。概念“以个性为特征”或者“根据个性”去定义,始终不会背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这个自然法则,否则也就不能称其为文化。所谓狭义,不过是文化这个主体前的一个限定条件,主体一旦不存在,限定条件的存在便毫无意义。

济、政治、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相互关系时,还把文化层面理解为好像一个透镜,有形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透过它分别折射成无形的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相关的解释是:(1)政治文化是政治行为在经济活动领域的折射,这表明管理行为不仅仅是对社会的,经济活动同样需要管理;经济文化是经济行为在政治活动领域的折射,这表明管理行为也要受到经济行为的影响,政治行为大多要牵扯到经济利益。(2)如果认为经济文化透过文化层面凝聚到政治文化,那么政治文化的根基就在经济文化。(3)文化层面不可缺少的中介作用,决定了有形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与无形的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构成大社会文化。文化看似无所不包,实际上反映的是时间过滤下来的都会成为文化。

(一)政治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

政治的特征是“秩序 管理”。中韩日在民主意识上有同质性。民主无非是公民的人权、民权的实际体现。中韩日在国家管理权意识上有异质性,中国的特征是包含多党合作成分的一党执政,韩国、日本的特征是各党派竞争执政。针对政府管理功能与产业演进的内在联系,这里举一个例子,它是韩国的,见下面经过归纳整理的资料:

IT 产业技术政策演化(五个阶段)

- 20 世纪 60 年代 主要是引进外国技术,形成技术基础结构。
- 70 年代 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促进研究开发能力。
- 80 年代 强化自主研究开发,大力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
- 90 年代 目标是在关键领域赶超发达国家,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
- 21 世纪 战略导向是力圆“世界信息产业强国梦”。

政策导向

- R & D 法规 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鼓励技术开发。
制定产业激励机制,激励政策对 R & D 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 R & D 计划 制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中期计划。
强化国家 R & D 项目计划(包括高度先进国家项目计划、战略性国家 R & D 项目计划、国际合作项目计划),重点开发主导经济发展和对外出口的 IT 技术。
重点加强国家 R & D 项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尖端 IT 技术 R & D 的全球化,全面提高韩国 IT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R & D 重点 微电子和光电子技术 微电子主要是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光电子主要是半导体光电器件技术的开发。
信息处理技术 主要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
信息传输技术,主要是通信技术。
信息应用技术 涉及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家庭自动化、人工智能以及互联通讯网。

2000 年制定的“信息通信技术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开发下一代互联网、光通信、数字广播、无线通信、软件、计算机等 6 个领域。

政府行为

- 借助外国 引进技术 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直接用于生产,由科研单位引进开发阶段的技术,加以创新后转让给国内企业。
引进外资 对外商投资有选择和控制。
推动国际合作开发技术 主要是开发关键技术。
- 示范国内 政府投资 (1)70 年代政府以战略性开发为目标,投资兴建了大德科学城,建立了韩国通信技术研究所、韩国电子技术研究所。(2)政府建立专门的研究生院——韩国高等科学院,培养和造就 R & D 的先导型人才(学科带头人)。(3)以巨额科技投入推动 IT 产业崛起,技术开发投资占 GNP 的比率逐年上升。
推动政府与民间合作开发技术 针对关键技术。
国家信息技术 R & D 创新体系
特点 以国家大企业集团为主体,国家信息技术研究所、大学、私营和民间机构共同参与。
运行机制 国家信息技术 R & D 创新机构 韩国科学技术院培养科技人才,直属韩国情报通信部,下设各类开发中心和各大学信息技术开发中心。核心技术大部分在这里开发完成。
跨国集团信息技术 R & D 创新机构 在国家支持下,三星、LG、现代、SK 成为韩国数字革命的领头企业。
私营企业和民间信息技术开发机构 政府多方面支持。
作用 法律法规为 R & D 创新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 & D 创新体系又为 IT 产业的崛起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韩国 IT 产业的迅速发展在韩国科技进步中具有代表性,这与政府的有关政策和措施有直接关系。韩国政府的作用突出地反映在“国家重点支持”上。

(二)经济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

中韩日在经济、工业化、经济增长等观念上有同质性,因此工业化 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实现工业化这个轨迹大体一致。中韩日在所有权观念上有异质性。以“公有”为主体进行工业化与以“私有”为主体进行工业化必然存在一些差别,目标一样但方法不同,那么在时间、速度、结果等方面也就需要我们做出分析和推测。其中大企业问题和中小企业问题就是相当难处理的。

这里我们特别提到的一个例子是高速增长阶段与后高速增长阶段的差异性。目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韩国已经步入后高速增长阶段,所面对的可能是不同问题,比如政府计划干预还是市场自由调节,政府做产业发展选择还是企业做产业发展选择,财政扩张政策还是财政平衡政策,金融

当然不能把它们比喻成物质与反物质那样存在着,因为按照丁肇中先生的解释,物质与反物质是不能相遇的,一旦相遇立刻就会变成了光。

“秩序 管理”所表达的意思是,由社会的秩序问题自然引出管理分工。



规制强化还是金融规制弱化,货币松弛政策还是货币紧缩政策,不同的新产业政策和不同的大企业规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编制了表4。

表4 高速增长阶段和后高速增长阶段的有关问题

	韩国	中国
目前所处阶段	后高速增长阶段	高速增长阶段
计划作用	政府计划干预	政府计划干预
产业发展	政府做产业发展选择	政府做产业发展选择
产业政策	扶:大企业;减:国有企业;放:中小企业	抓:大企业;放:中小企业;促:民营企业
财政政策	财政扩张政策	财政扩张政策到财政紧缩政策
货币政策	货币松弛政策与外向型增长相关	松弛 紧缩与引进型增长相关
金融规制	金融规制强化	金融规制强化
企业规制	规制弱化;财阀垄断市场;举债扩张	要改变规制弱化状态,强化企业规制
计划作用	要求政府计划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	×
产业发展	要求由企业做产业发展选择	×
产业政策	削弱:财阀;私:公共企业;促:中小企业	×
财政政策	平衡预算收支 扩张增加赤字	×
货币政策	货币紧缩政策与增长速度放慢相关	×
金融规制	金融规制弱化 重新金融规制强化	×
企业规制	强化规制;反垄断;定健康企业标准	×

说明:1. 韩国高速增长阶段正效果是:(1)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和中等收入社会。(2)贫富差距缩小。负效果是:(1)通货膨胀。(2)环境损害。(3)贸易摩擦。(4)社会经济发展失衡。(5)政府干预过度。2. 进入后高速增长阶段,客观要求:(1)发展的稳定性(价格、社会)、平衡性(经济与社会、产业、城乡)。(2)企业的效率性(生产)、自由性、国际性。相应地也存在一些问题:(1)财政政策方面,比如以增加赤字拉动内需与泡沫经济、经济停滞。(2)货币金融方面,存量货币与消费下降,利率走低、通货紧缩,鼓励投资、消费与贷款—信用规模过大、失控。(3)产业政策方面,比如产业结构升级与企业意愿,淘汰衰退产业与社会阻力(利益集团),特别是在规制财阀与维护财阀问题上,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负责制定政策)与韩国产业资源部等(实施相关政策)出现对立。3. 后高速增长阶段共性的主要经济威胁是经济自由化带来的金融风险,韩国个性经济问题主要是劳资纠纷。

另外一个例子与传播产业有关。分析传播产业以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揭示包含在这种文化因素当中的主体意识与客观环境的关系。这也是个“主体心理—主体行为—主客关系”问题。在“自我圈”,需求与心理有关,心理涉及动机(目标性内驱力)、观念(规则性强迫力),从而主导了行为,表现出或独自型的,或交往型的,而交往必然牵涉到关系,于是进入“社会圈”。在“社会圈”,一方面,“政府—民间”涉及法律、政策,“企业—客户”涉及产品、服务,“个人—社群”涉及产品、秩序;另一方面,“政府—民间”又涉及规则供给或服从需求,“企业—客户”又涉及用物供给或消费需求,“个人—社群”又涉及物质需求、规则需求和附群需求。“个人—社群”中的“社群”是指社会群体,像政府、企业、政党、社团、宗教等都属于这种群

体。由“个人—社群”关系框架引出个人对社会群体的3种需求,其中物质需求指向企业,规则需求指向政府,附群需求(意思是附着在某群体上)指向群体,主要是政党、社团和宗教。如果把企业也看做单个实体,于是个人范畴对政府的规则需求主要体现到公平、平等、自由3个概念。公平涉及公平竞争、公平参与交换、公平参与管理,公平连带着平等,即规则公平的前提条件是人权平等,而平等又相应地带出民主、自由。也就是说,竞争应当表现为公平竞争、平等竞争和自由竞争,交换应当表现为公平交换、平等交换和自由交换,管理应当表现为公平参与、平等参与和民主参与。下面的表格解释了这个问题:

	平等	公平	自由	民主
竞争				×
交换				×
管理			×	

表格当中在“自由—管理”组合结果项出现了“、×”这两个符号,“”是指“候选人可以自由竞争”,它来自P.亨廷顿“民主定义”,“×”是指经过“选举—竞争”制度安排的、拥有决策权的决策层面并非人人都可以自由控制,在社会管理领域“少数人法则”(少数人控制管理的普遍原则)不可避免,它来自M.韦伯“民主解释”和A.熊彼特“民主定义”。

传播产业基本上有3种功能,这就是获取消息、积累知识、休闲,并且分别涉及传播产业的不同构成因子。比如,“获取消息”涉及电视、广播、报纸,“积累知识”涉及图书馆、期刊和出版印刷,“休闲”涉及娱乐、体育、旅游、鉴赏以及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等。实际上3种功能也不会绝对地独立存在,具体反映在传播产业的构成因子上它们往往又交织在一起,特别是作为传播产业构成因子之一的互联网典型地集3种功能于一身。传播产业的主要构成因子可以集中到5个项目,即:广播电视业,报刊和出版印刷,旅游,体育,因特网。

(三) 习俗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

人们总是用儒学文化来说明中韩日在习俗文化上的同质性,又以民族个性说明习俗文化的异质性。这里我们仅借助两个问题做一下讨论。

1. 知识构成。用单一的量化指标来说明一个民族的知识构成,不是说不能做到,但非常困难。普遍的看法是,韩国传统文化包含着大量的儒学文化成分。这大概在两点上表现得较为突出,一是祭祀活动,一是教育。(1)从传统上讲韩国人普通的日常生活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很大,今天韩国祭祀活

关系在公共关系领域,还涉及内部公共关系、外部公共关系。
P.亨廷顿“民主定义”：“最高权力的集体决策者通过公平、正直和定期的选举产生,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竞争,在事实上使所有成年人有资格参加选举”；“全民选举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A.熊彼特“民主定义”：“民主的方法是为了做出政治决定而做的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制度下,想获得决策权的人要在人民的选举中通过竞争而产生。”

动的基本构造是以朱子理学代表的儒家礼为中心。祭祀活动是儒学文化古礼当中重要的一环,祭祀的精神意义是仁和孝,一连串的祭祀活动最能表现出儒学文化的孝道思想及伦理观念。很多儒学文化的祭祀活动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找不到踪迹,可是在韩国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儒学文化曾经对韩半岛的文化、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2)根据历史轨迹判断,韩国的教育受3个阶段的影响,也就是受中国儒学文化自然扩散的影响阶段、受日本文化强制灌输的影响阶段和受美国文化自然扩散的影响阶段。所以,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某种替代作用是不能忽略的。

2. 观念的来源因子和观念的外推空间。在韩国文化中“我们”和“恨”这两个观念占有相当的位置。韩国研究人员对它的解释见表5。

表5 韩国文化中两个典型观念——“我们”、“恨”

观念	“我们”(“我们”情结)	“恨”(“恨”心理)
定义	“我们”本意是小的建筑物和范围。	由于他人或社会的阻碍、歧视等,使个体(或集团)受到欲求(或动机)挫折,叫结恨。
来源因子	“我们”与“涵义是建筑物”的“家”有内在联系。 “我们在血缘关系上超越我和我的范围而形成另一个空间,在那里维持着情的共感带。” ^[6] “家”是“超越个人生命的、祖先和子孙一体的永恒的生命体。” ^{[7](P255)}	因战争、自然灾害等而结恨。 具体有:失去国家主权的恨、民族分裂的恨、离开亲戚、故乡的恨、等级、名分差别的恨、礼教束缚的恨。
外推空间	“我们家”指家庭,但与同族交谈不用该词而是在别人或异族面前使用。可见又相当于同族。 “我们”也指群体,是自己所在的群体。“我们”的含义可以在家族、社会和国家当中伸缩。 “我群感”(“我们”意识),体现为家族意识,家族包括小家、大家、“我们家”、长子(大家)与非长子(小家)、嫡子与庶子的名分差别,养子制度的异姓不养原则。“我们家”实为同族,这时家、族的结构在超越时空形成,追求同一性和自豪感,叫根本。	解恨的途径: 复仇,即报复造成恨的对方。 代偿,即借助后代予以弥补。 比如自己因贫穷而没有学习,就让子女学习解恨。 发泄,即情感宣泄,一般通过文艺等途径。比如,某村举办院子剧等民众文化活动。院子剧的特点是不分演员、观众(没有特别的舞台),观众不断参与,以此发泄恨,使心情好转,然后同演员一起举行祝贺。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5]。

关于“我们”观念的外推,韩国的“开放的我们党”又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开放”意味着扩展空间或扩大范围,“我们”明显反映出在制造“我群感”,引发民众的同一性,以此实现该政党所追求的目标。

现在我想探讨个人主义在韩国现代社会有多大的市场。如果我们把“我群感”也可以定性为惟我主义,也就是说“我群”明确是“我”的“群”而不是“你”或“他”的,那么它犹如橡皮筋般伸张后终归要收缩回来,收缩到“我”,自然地定位在个人主义上。虽然“我群”的“群”带有集体主义色彩,但是“群”内

部的等级差别又导致个人的结恨,从而“恨”心理产生的作用比“我们”情结要大得多。一个社会中,当仇恨心态超过友好心态时,民族内的集体团结性就会有疑问。曾经有人评论:“尽管韩国人相对来说也以群体为中心,但是他们也如西方人一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特点。韩国人经常开玩笑说一个韩国人可以战胜一个日本人,但是一群韩国人就必定会被一群日本人击败。”为什么? F. Fukuyama 给的答案是韩国“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8](P137)}。还有一个问题,由“我群感”主导,似乎属于“我群”的成员就应该相互帮助,那么怎么就“应该”呢,这里的责任和义务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

三、最终目的:揭示中韩日在21世纪初期的社会结构变迁这个问题

限于篇幅暂时撇开中国、日本不谈,不妨只涉及有关韩国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今天韩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是担负行政管理任务的公务员群体却没有具备较高的资本主义意识。最近韩国出版的一本书《儒教文化的两种面貌》是由一个研究报告构成的,它以近两年韩国和中国的公务员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韩国方面的调查对象是20、30岁年龄层和40岁年龄层以上各200名。其中一个问题“即使有肯给更高月薪的公司,也会尽可能一辈子在原公司上班”,对此做出肯定回答的,20、30岁年龄层中有52.7%,40岁年龄层以上中有76%^[9]。这反映出资本主义意识相当淡薄,可以认为是经济演进与意识演进不吻合的一种表现。

第二个问题,韩国学者有这样的看法:(1)“在韩国社会中,虽然也有本土的文化,但大多经历了日本文化的浸染”;(2)“在评说优劣的时候,人们总是暗示西欧文化的先进性”;(3)“在今天,韩国文化吸收了20世纪50年代源于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潮”^[10]。实际上这和笔者的理解是吻合的。也就是说,今天的韩国文化在近百年来受到日本文化、日本化的西欧文化、美国文化的影响,已经融合了它们当中的一些成分。今天的韩国人表面看几乎都对日本文化表示反感,但内心又折服于日本文化,存在对日本文化在心理上一种表里不一的矛盾性或双重性,其中包含着“恨”当年日本对韩半岛的殖民统治、羡慕日本自近代以来所取得的工业化成就这两个因素。不过日本文化的欧美化却是韩国文化总也学不像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就交换来说存在一个先期投入问题,而“我群”的这种帮助如果与交换无关,它带来的会是什么呢?你拥有的东西要均分一部分给我,显然是一种不劳而获。写出《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一书的 E. Banfield 把“超道德的家庭主义”解释为:“将物质的、眼前的小家庭的好处最大化;并假设人人都一样。这种个人主义使群内人”根本不能走到一起来组织学校、医院、企业、慈善机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组织”,只是“相信政府有义务来承担这个风险”^{[8](P98-99)}。如果“我群感”最终走到“超道德的家庭主义”,那么“群”内部平均主义就是它的归宿,其成员个个都会是极端自私的人。也就是说,以表面上的“群”内部每个人都不应自私(帮助他人)开始,由实际上的“群”内部的人人极端自私终结。

这里只通过一个例子来做简单的探讨。按照韩国一位学者的观点,“韩国几乎不再使用汉字,而是普遍使用韩国文字,英语教育越来越得到强化,这些趋势正表明韩国想脱离东亚的传统,编入西欧文化的热切愿望”,换句话说,韩国认为“通过脱亚入欧的努力,能走独立自存的路”^{[11](P200)}。我的思考恰恰与此相反:(1)“不再使用汉字”体现的是文字拼音化,大概世界上中国可以具有象形文字专利,当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也曾提倡汉字拼音化,只是没有成功,但给今天电脑使用的普及带来最大益处,因此文字拼音化并不等于“脱亚”;(2)强化英语教育是交流国际化的需要,有利于国际间的相互交流,历史因素造成的、当今以英语代表国际通用语言,它已经从专有的英—欧文化转化为可共享的国际文化,因此交流国际化并不等于“入欧”。也可以这样认为,历史上东亚的文字汉字化,着眼点在语言文字化,客观上也起到交流国际化的作用。只不过昨天的交流国际化局限在区域甚至局域这种狭小范围,今天的交流国际化是在世界整体、广阔范围。如果再从问题的源头分析,显然与“脱亚入欧”论有直接关系,它是日本在近代首先提出来的。人们对它有不同理解,比如“脱离亚洲,实现精神和文化编入西方”,这个就与中国在近代提出的中体西用论有明显差异。“中体”以儒学文化为代表,它本来就是中国出产的东西,日本既然可以借用它,那么也可以不用它而另外借用比如西方的。即

便是“和魂洋才”论,“和魂”也明确表明它绝非儒学,或者说不等于以儒学为“体”。同样道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韩国可以借用儒学文化,也可以不用它而另外借用西方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联络情感母语要优越于文字,特别在拼音文字方面,文字仅仅是语言的符号化。现在的问题又需要换一个角度讨论,日本式“脱亚入欧”不是韩国能够真正学会的,可以模仿但很难掌握其实质。用我所理解的来表述,就是:

日本式脱亚入欧 = 脱亚入欧 + 创新能力强

韩国化脱亚入欧 = 脱亚入欧 - 创新能力弱

这样一来,必然会产生两个不同结果。日本有“+”因素存在,不仅“入欧”而且能够“超欧”。韩国“—”因素存在,外表带有“入欧”色彩但内核始终没有“脱”日本化东亚文化这个怪圈。外表带有“入欧”色彩,主要是受日本化西欧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先后影响,其中日本化西欧文化的特征表现为围绕着“脱亚入欧”论尽可能地将西欧文化日本化。日本化东亚文化怪圈,其主要特征来自武士道—大和魂和祭祀—情感圈,前者造成对外部世界的攻击性,包括对非“我群”的极端排外主义;后者导致圈内友善、圈外对立,圈外对立也就是极端排外主义。韩国化脱亚入欧没有学会日本式脱亚入欧,反倒在某种程度上变形为已经落伍于时代的日本化东亚文化怪圈模式,圈外人之间缺乏一种主动的合作意识,这应该是当代韩国文化的致命弱点。

[参 考 文 献]

- [1]陈勇勤. 管理思维导论[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
- [2]李强.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 [3]陈观胜,等(编译). 社会学是什么[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4]孙立平. 社会现代化[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 [5][韩]丁夏荣. 韩国的传统家文化[J]. 当代韩国, 2001, (夏季号).
- [6][韩]李秀远. 韩国人的人际关系和情[J]. 汉阳大学教育论丛, 1984, (1).
- [7][韩]崔在锡. 韩国家族研究[M]. 汉城:民众书馆, 1966.
- [8][日]福山.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1.
- [9][韩]金荣枰, 郑仁和. 儒教文化的两种面貌[M]. 汉城:亚研出版社, 2004. (资料来源:www.donga.com)
- [10][韩]朴基成. 韩国地方社会的大众媒体与文化行政[J]. 当代韩国, 2002, (秋季号).
- [11]国际学术会议组委会. 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G].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谭笑珉]

The Problem of Hom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in the Culture Factor Contained in the Economy Interaction ——Take the Phenomenon of the Fleetly Increasing Economy of the Northeast Asia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Korea and Japan as Examples

CHEN Yong-qi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t's hard to quantify the culture factor in the economy models, so the research technique takes much importance. We should distinguish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bserve the inter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and macrocosm and dynamic analysis, and identify the hom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economy culture and convention culture. The ultimate aim is to open out the problem of the society structure variance of the three countries in the beginning of 21 century.

Key words: economy interaction; culture factor; homogeneity; heterogeneity; Northeast Asia

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和魂洋才”,应该说与近代中国的“中体西用”基本上相同。一个强调日本传统精神,一个强调中国传统精神,都属于并不放弃对本土文化的重视。